

《霸权之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霸权之后》

13位ISBN编号：9787208059436

10位ISBN编号：7208059438

出版时间：2006年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美）罗伯特·基欧汉

页数：276

译者：苏长和,信强,何曜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霸权之后》

内容概要

本书是迄今为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合作问题进行研究的最为全面、也是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在没有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国际合作能够维持下去吗？为了回答当代世界政治中的这一紧迫问题，基欧汉教授分析了世界政治经济中合作得以发生的国际制度（或者国际机制）的作用，以及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这些国际机制的演变情况。基欧汉教授并不认为霸权的衰落会使国际合作变得不可能，相反，他认为国际制度的设计能够促进利己主义政府间的合作。

本书涉猎广泛，基欧汉教授借助档案研究、口头访记、国际政治理论、理性选择分析、微观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对后霸权时代的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结论。本书因此成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最权威、征引率最高的著作之一。

《霸权之后》

作者简介

罗伯特·基欧汉（1941- ）系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美国政治学会前任主席，曾任斯坦福大学、伯兰德斯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现为杜克大学政治系詹姆斯·杜克教授，著有《权力与相互依赖》（与约瑟夫·奈合著）、《国际制度与国家权力》等书。

《霸权之后》

书籍目录

解读《霸权之后》——基欧汉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 中文版前言 英文版前言 第一部分 问题与概念 第一章 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合作 第二章 政治学、经济学与国际体系 第三章 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 第二部分 合作与国际机制理论 第四章 合作与国际机制 第五章 理性选择与功能的解释 第六章 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 第七章 有限理性与自我利益的再界定 第三部分 实践中的霸权与合作 第八章 战后时代的霸权合作 第九章 霸权机制的不完全衰落 第十章 消费国石油机制(1974—1981年) 第四部分 结 论 第十一章 制度的价值与多变的代价 参考文献 译后记

世界政治中各种各样的行为者，包括像跨国公司这样的非国家行为者(Keohane and Nye, 1972)，都在追求着财富和权力。但是只有国家才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行为者，它们不但直接寻求财富和权力，而且还竭力构造使它们能够长远地达到这些目标的规则和行动框架。因此，在分析国际合作和国际机制问题时，我们将把国家置于我们分析的中心地位。国家行为可以根据“由内及外”或者“由外及内”的方法来研究(Waltz, 1979, p.63)。“由内及外”的解释方法，或者单位层次的解释(unit-level)方法，将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源视为其内部因素决定的，这些内部因素如政治或经济体制，领导者的特性，或者国内政治文化等。国家对外行为“由外及内”的解释方法，或者体系的解释方法，是以体系总体上的特性为基础的。当然，任何理论除了考虑体系自身的特性以外，还会考虑行为者的特性。但是体系理论则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成不变的常量而非反复不定的变量；体系理论的变量是由环境形成的(situational)：它们是指每个行为者与其他行为者相对而得的位置(Waltz, 1979, pp.67—73; Keohane, 1983, p.508)。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分析是根据相对权力和相对财富的内容来确定行为者在体系中的位置开始的。

华尔兹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不从总体上考虑国际体系的影响，而单单从单位层次分析出发来建构理论的错误所在。所以这样说，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单位层次上作因果分析是困难的，因为气质或特性因素(从领导人的个性到一个既定国家制度的特殊性)在这种分析中只具有表面上的重要意义。如果以此出发进行分析的话，即使是那种只作局部“切割”研究的简约理论，也会处于因为过多的与研究似乎相关的事实所导致的混乱之中。第二，单单从“由内及外”的方法来解释国家的行为，会导致研究者忽视行动的背景问题，因为各国处于竞争状态这个事实，对所有国家都会产生压力。因此，那些试图平衡潜在对手权力的实践和行为，如果从政府独特的特征基础上解释也许就是成问题的，而如果把它们放在世界政治固有特征的基础上，则可能得到更加满意的解释。总之，如果不给体系理论予以优先考虑，世界政治中的单位层次分析只会在经验和概念的真空(封闭)状态中飘忽不定，无所适从(Waltz, 1979, 第4—5章)。因为这些原因，本书的分析是从体系层次的分析开始的。我集中探讨体系特征的影响，因为我相信，国家的行为，还有其他行为者的行为，强烈地受到国际环境所决定的限制和激励因素的影响。当国际体系发生变化时，激励因素和行为也会发生变化。因此，本书“由外及内”的研究视角与现实主义(或者说结构现实主义。Krasner, 1983)理论中的体系理论方法是相似的。不过，我的论述和结构现实主义的区别在于，我强调国际制度及其实践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诚然，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状态的作用，当然是重要的；财富分配状态的重要性同样如此。但是，国际体系层次上的人类活动同样会施加重要的影响。国际机制影响着政府可能获得的信息和机会，政府对支持这类国际制度的承诺的破坏，会对其声誉造成损害。国际机制因此改变着政府对其利益或有利地位的估算。为了解释国家的行为，仅仅将基于权力和财富分配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和强调选择的对外政策分析者的理论结合起来，而不理解国际机制的作用，就像我们解释寡头商业公司之间的合作与串谋而不竭力去弄清楚以下一些事实可能犯有的错误是一样的，例如这些寡头垄断企业的领导是否经常一起会面，他们是否属于同样的贸易协会，或者他们是否已经发展了不通过直接沟通就有了一种非正式的协调行为的手段。因此，国际机制不仅仅值得彻底的研究，而且它们事实上也迫切需要我们这样做。然而，没有一种体系分析会是完美无缺的。当我们在第三部分探讨战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时，我们将不得不超越体系分析模式，走向强调国内制度和领导人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的模式上去。也就是说，我们将不得不引入单位层次的分析方法。 P24-25

《霸权之后》

编辑推荐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涉猎广泛，基欧汉教授借助档案研究、口头访记、国际政治理论、理性选择分析、微观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对后霸权时代的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结论。《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因此成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最权威、征引率最高的著作之一。

《霸权之后》

精彩短评

- 1、基欧汉的经典作品，强烈推荐
- 2、制度主义在实用派的世界可以找到很多立足点。
- 3、读书报告过~
- 4、论证很有力..
- 5、著名学者基欧汉，orz
- 6、国际机制虽好，如何破解国际机制中的话语霸权问题还需要继续努力
- 7、老子看不懂
- 8、@国际政治学概论 为了赶陈岳的期中论文翻的
- 9、文化研究也要看这个书，整个人都不好了。
- 10、基欧汉文笔还是比较好的~~翻译的也不错~~
- 11、重读了一遍。基欧汉的这本书基本上是超不过沃尔兹的了。新自由主义不过是对新现的补充。这也注定了之后的新新之辩很快就变成了新新趋同。顺便一提，我最近看了来自星星的你
- 12、这本书分数没理由不高啊，新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呀，当然作者本身说明自己不代表现实主义或者自由主义
- 13、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合作与其说是一种目标，还不如说是达成各种目标的手段。
- 14、pathfinder
- 15、引用很多文献，算是综述类的，但是逻辑很差，犯了后此谬误和循环论证的错。。。。
- 16、【夹了10块钱在里面当书签忘了拿出来就还给图书馆了呜呜！】基欧汉大叔【还是大爷.....】奇才~苏长和的翻译很到位，剩下两位就不敢恭维了.....硬着头皮读起来真心麻烦.....
- 17、第一本国际关系理论专著。
- 18、解读新自由主义不得不看的书.
- 19、经典，不多言，径直取来阅读便好。
- 20、值得一看~~
- 21、大师的书嘛
- 22、恩，结果还不错！！嘿嘿！！朱老师，真好真好！！
- 23、看得不是太认真。有空看一下英文版。
- 24、新自由制度主义
- 25、经典，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作，但没有霸权，制度还有用吗？某国挑战制度怎么办？
- 26、虽然自己是这个专业的，但是大二之后就对国际关系失去了兴趣，还是给个四分吧。
- 27、我差点以为自己在看一本经济学方面的书
- 28、时代的产物。不要被某人的书评误导。注意原文立场
- 29、主要运用理论校正与推演得出了霸权后合作仍将维持的结论，并有国际能源机构的验证，文末对于合作的价值探讨具有深刻的哲学意味。
- 30、和旺仔说的一样，题目翻译不合适。内容是真心棒。
- 31、恩。。。
- 32、国政经.....不是姐的菜!!!
- 33、自由主义扛鼎之作，有了这本书，约瑟夫奈一辈子也干不过他的好基友了
- 34、部分章节深有体悟，但整体自己读的不够好。读后印象有些支离破碎。
- 35、他发现议题的敏锐程度让他成为一代宗师
- 36、还是写不出来--
- 37、太专业了，各种吃力。
- 38、【新自由制度主义】
- 39、基欧汉清晰地阐述了霸权国家、国际机制与国际合作之间的关系。二战后，美国以霸权的优势建立了资本和贸易领域的国际机制。这些机制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霸权衰落之后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石油领域更为典型，美国一直通过霸权的权威进行非制度化却强力有效的控制与合作。但

《霸权之后》

是一旦权威衰落，石油领域陷入混乱，直到国际能源机制的建立重新确立了这一领域国际合作的新秩序。

这本书思路清晰，语言比较通俗，运用了较多经济学领域的理论（理性假设、利己主义、市场失灵等），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总的来说，这本书读起来还是很有趣的。

40、书很好，推荐，和国内主流还是不一样的，但是没有为我论文提供灵感==

41、2011年8月。泛读。有点循环论证的意思，霸权可以创造国际合作，但霸权的崩溃与衰落不可避免，这会导致国际均势破坏，再次陷入混乱。基于此，我们需要另辟蹊径，以求得均衡的维持。那么，另一条路是什么呢？基努汉给出的答案是，国际机制。可是国际机制如何建立呢？他认为应该延续霸权存在时建立的一系列规则，这样避免了新机制建立的成本和冲突，有助于机制的顺畅运行。因此，他再次强调，霸权存在时，霸权国家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国际机制。然而，众所周知，规则制定者会制定有利于其自身的机制，因此，由霸权国家建立起的机制明显会在霸权之后继续对弱小国家进行压迫。那么，这种国际机制的合法性就成了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作者没有给出答案。再次吐槽，为什么搞政治的这么多都叫罗伯特.....

42、跳过了案例分析两章

43、仔细读过一遍，不同的章节也有过精读的。国际关系学者的必读书。罗伯特·基欧汉确实是一位大家，逻辑非常严密。

44、开启我的国政狗岁月。

45、没有达到足够的启发效果

46、制度自由主义代表作，木有了奈之后写的，但是还是有一些逻辑上的漏洞

47、从现实主义脚都出发，解读国际制度和机制的意义，本书认可霸权对创造一个国际机制的作用，但同时认为，当霸权衰落时，没有霸权虽然会使创造新的国际机制变得困难，但现有的国际机制是可以存续的，并有其存续下去的意义。

48、这本书居然拖了两年才读完，一边读一边被自己的懈怠恶心着.....

49、相互依赖的脆弱性和敏感性～醍醐灌顶

50、值得好好读一读。

1、相对原作，苏先生的翻译作的虽有些生硬，但相对英语语言基础颇弱的人还是一本相当好的国际关系学的入门读物；原作的目的是让更加广泛的人群来关注时事，所以特意避免了许多专业词汇，而出自苏先生之口，翻身成为教科书一般的读物，旨在可惜可惜啊，除去其伪道学的外衣，这本书值得大家细细品味

2、霸权过后教科书一般的论文写作，从霸权、机制、合作与纷争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讨论在当今世界，美国后霸权时代下，世界政治经济现状的原因。书中首先批判了正统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体系要维持稳定，需要一个霸权国家或霸主存在，世界政治中的秩序是由一个主导国家创立的。现实主义者或许从简单的“囚徒困境”得出，理性国家在缺乏制约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会考虑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即在博弈中选择“背叛”。而霸权国家，或是霸权国家主导的世界机制的存在，能够维持管理国家对规则的遵守。而霸权的衰弱，则会导致国际机制的衰微，世界秩序的混乱。基欧汉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霸权崩溃与国际机制崩溃之间存在“时滞”，机制维持具有惯性，使霸权过后的世界合作与和平依然可行。关键在于机制的维持和建设。事实上，霸权与机制是相互补充，甚至相互替代，两者都可以使国家间合作、协议的达成成为可能，并有利于促进国家遵守规则。这也是为什么说“后霸权时代”通过对机制的维持能够维持世界秩序。而这也是大多数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所积极寻求的，它们渴望合作。国家是理性的，会选择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那条道路。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利益相互交织，相互重叠，交往、交易的密度使得国家更多重视国际关系中的长期利益，而放弃短视的自我利益最大化。合作来源于冲突。在当今利益冲突加剧的情况下，又想获得长期利益，国家会选择诉诸合作。而合作产生的条件就是存在于既有的国际机制中，这也是为什么在霸权衰弱后，其主导的机制能够得以维持和延续，因为创建一个机制的成本是高昂的，而机制又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机制中，机制对合作出现和进步的贡献，不是因为执行国家所要遵守的规则，而是通过改变国家以自我利益为基础的决策环境来达到的。因为要达成合作，国家必须放弃短视的自我利益作出让步来换来稳定长期的合作利益。这就为政府彼此达成相互有利的协议提供了可能。机制与国际法一样，虽然其规则不具有强烈的约束力，但是它使人类的行动符合可预测的模式，从而使预计的行动能够在手段和目的之间获得一种理性的关系中前进。使在机制中的国家预期他国会遵守规则而做出判断决策，实现“囚徒困境”中的最优解。然而，这也存在局限性。合作既可能自我增强，也有可能自我限制。机制的稳定性有时反而限制了合作的深入发展。例如，一个业已存在的货币机制保持合作更为容易。但是，这一机制又使美国没有必要调整政策以防止其崩溃。既然合作产生于实际和潜在的纷争，纷争也许就是促进国际大前进的必要条件。国际机制试图维持合作模式，却未能真正促进合作的拓展。

3、苏长和先生自己也说，对这部作为国际关系学界掣肘的作品的翻译也是“信达”而并没有提到“雅”。的确，这部译作在字词翻译上很多地方值得商榷和探讨，而问题是，用偏激的、挑剔的目光看这部作品应该是译者的任务，而经不起考验的往往是读者的耐力和忖度水平。

4、在《霸权之后》一书中，作者罗伯特·基欧汉主要围绕“霸权之后合作的可能性”这一中心问题进行展开，并得出结论——霸权与国际机制都不是合作的必要条件，但国际机制本身的优越性仍可以在后霸权时代促进合作。而我将从本书的研究思路、写作意义和不足之处三个方面来谈谈自己的阅读感悟。首先，在研究思路，基欧汉采取了包容性、辩证性的思维方式。在理论流派上，制度主义强调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源于国际间的共同利益，而现实主义则侧重美国霸权的影响，基欧汉并没有简单地站队，而是在理论层面寻求一种综合——即基于现实主义的假设探讨国际制度在实现国家间共同利益的意义；与此同时摒弃了“无政府状态”和“等级制”的二元分法，把国际机制看作是非等级状态下的一种协调。在研究方法上，则选取了跨学科的方式，借鉴制度经济学中囚徒困境、理性选择、市场失灵等内容对国际机制存在的价值进行论证，但基欧汉并未仅仅停留在利己主义的假设之上，而是选择继续从国际现实出发，讨论在国家间信息不充分的有限理性条件下国际机制的必要性；在第三部分对现实的论述中，也并未一味地打压“霸权稳定论”，而是通过对石油、贸易和金融组织的比较，有区别地看待霸权在不同领域合作中发挥的作用，借助机制本身的价值来对“霸权稳定论”进行补充。因此在阅读后，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单独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独当一面，在研究中应该采取包容的心态，把诸多理论流派当做解释和预见国际政治复杂多变形式的工具，而非采取非此即彼的学术态度；除此之外，还应锻炼一种辩证性的思维方式，不断地拷问自己，当一种假定前提发生

变化时，自己的猜想还能否经得起检验。其次，我想讨论一下本书的写作意义。《霸权之后》出版于1984年，随着日本、欧洲的崛起，当时美国占世界经济比重已不如前，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仍然在国际上处于主导地位，并在90年代苏联解体后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因此，《霸权之后》更像是基欧汉对国际政治的一种预言，但这在当时并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霸权稳定论”预言，美国霸权的持续衰落将会促使国际制度解体，但基欧汉认为霸权的存在有利于国际机制的形成，而国家本身的现实主义考量则会使国际机制在后霸权时代得以维持，为当时国际关系的何去何从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可能性。而在32年后的今天，国际社会的现实似乎也不断映证了基欧汉的推断。从一超到多强的世界格局，从霸权主导到全球性、区域性、多主体、多领域国际机制共存的局面，政府出于对自身声誉、害怕报复以及形成坏的先例的考虑，会遵从而非破坏国际机制的规则，以减少交易成本、不确定性，提高对他国行动的可预见性，从而最大化自身的利益。国际制度不仅经受住了单极世界的考验，在多极世界中更是开花结果，在促进国际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时间的局限，《霸权之后》一书仍存在一些不足。在本书第二部分的理论推导中，作者把国家假设为一个具有理性的趋利个体，却没有涉及到个体内部的情况即国内政治因素与国际机制的关联。另外，基欧汉认为国际机制自身的优越性吸引国家遵循其规则，但未考虑到国家间的差异，由于发展水平的不同，弱国有可能被胁迫而非自愿地加入国家机制，而对其的遵守也未必符合其国家利益，或被强国排斥于有利的机制之外。除此之外，基欧汉将机制的形成更多地理解为一种工具性和形势性依赖，而将移情性依赖作为对前者的补充或掩饰国家真正行动目的的面纱，然后在当今社会许多超国家的国际组织建立起来，对人权的持续关注使得单纯的移情性相互依赖日渐显著。当然，这一推断仍需得到时间的检验。在阅读《霸权之后》的过程中，我不仅了解了关于制度经济学和二战后石油机制的相关知识，更领悟到杰出国际政治学者严谨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态度。阅读之后再去看一遍基欧汉写在不同年份的前言，随着现实不断推进，作者再次回顾自己几十年建构的理论，每一阶段都有新的学者对其进行批判或补充，而作者的每一次回顾也都有新的体悟和反思，仿佛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思维游戏，我想，或许这也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趣味之所在吧。

5、时隔多年，再读《霸权之后》，会有新的感受。当年苏长和教授在前言中提出的问题，即如何改良国际机制本身，在当今得到了体现。2014年，金砖国家决定设立金砖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事实上即是谋求破局，改变西方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6、这本书和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是8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学术界引用率最高的著作，主要探讨了霸权后的国际合作何以可能，运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且苏长和教授的翻译也很用心和独到，对于学国际政治的对国际政治感兴趣的朋友，该书值得一读。

7、鸠汉的这本名著被认为奠定了他在国际关系领域“新自由制度主义”奠基人的地位，借此以能够和肯尼斯·华尔兹对话。然而，如今来看，鸠汉提出的几个前提、几项原则。已经不成其为研究IP的基本原则。当初的笃信者长和先生也开始转向建构主义。可以说，鸠汉的这本书有其历史价值，但更多的是为现实主义做了注解，成了现实主义的“他者”。而要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范式，恐怕还不能够。有幸受长和老师指点，所得颇多。但此套丛书翻译的多有不善，并不能因此而一笔盖过。

8、一个月前断续地看完了这本书，很多地方虽然不是很懂，大概就看过去了。今天重新翻了一下，又有了新的理解，与书友们讨论：)在古典理性主义中，人可以在不考虑决策成本的状态下，完美地分析各种方案的成败得失。在这种情况下，基欧汉采用了功能主义分析。制度具有增强确定性等一系列对于国家来说的有利点。但存有这些有利点，并不代表就没有对国家有害的点，也不是说一定比替代方案优秀，导致国家会优先采用国际制度的方案。这是功能主义分析的弊端。于是接下来引入了有限理性的概念。任何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都不可能如古典理性主义所预言的那样，分析出他面临的所有事件上的所有选择的的所有利弊得失和前景。做一个决策是有成本的。因此一个正常人总会把首先做一定的理性分析，然后把它上升为规则范畴，简化做决策的成本。比如，我们理性分析过，认为晚上刷牙是一件好事（这其实很笼统，如果刚刚做了牙的手术，刷牙就是一件坏事），当我们得出这个结论，上升到规则范畴之后，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就会直接进行刷牙的决策，当然也不妨碍我们在个别情况做出不刷牙的决策。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更是不可能不首先确立一定的规则。否则中层人员遇见事情怎么处理呢？不能总问总理吧。（个人觉得这个是国家越民主，规则越多。）政府的这种特性对于机制有什么影响呢？第一，它会增强政府对机制的这一方案的偏好。事事计算选最优是古典主义的说法。就像经济学总在假设我们会在同样质量下买最便宜，可是事实上大家能货比两家就不错了。而机制更多的提供了一种照着做不是最优，但是差不多也能达到满意的状态。在政府强大的情性下

《霸权之后》

，会更受欢迎。这或多或少弥补了前面功能主义分析没有分析替代方案的缺陷。第二，政府总之也是在遵守内部原则，遵守外部原则还能得到其他的好处，如邻国的确定性，合作的更大可能。我觉得基欧汉这点说的有点讨巧了。不过正如人做选择也会在习惯和一两个替代选择间犹豫一下，机制的维持在我看来也是不易的啊。

9、这本书可以说是我看的国际关系理论专著的第一本 前后看了好几遍 理论部分后来又看了一遍英文版这是国际关系自由制度主义的顶峰 现在看来很多问题仍未超越这本书中所述 谈论国际关系理论实难略过这本重量级的作品 借鉴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 这本书是国际制度的功能理论在体系层面的完美论述 深刻的论述了霸权之后国际制度仍旧存在并且有助于国际秩序的维持 这是来自于国际制度提供信息 降低交易成本 减少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功能所致 当然此理论有重复论述（即因为制度有此功能所以制度存在的弊端）等等不足之处 但是它的提出无疑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向着一个新的高峰发展 国际关系学科的逐步成熟只有靠着这种扛鼎级的作品方能逐步积累成型

章节试读

1、《霸权之后》的笔记-第1页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

[美] 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解读《霸权之后》——基欧汉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

新自由制度主义（non-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权力与利益是世界政治的全部内容，抑或是也在起作用呢？……一方面，因为国际相互依赖加强而引起的国家间关系的调控与管理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另一方面，伴随着跨国交往的进步，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活跃在世界政治的舞台上。 p

国内关系即使不从属与国际关系，至少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世界政治经济力量愈来愈多的影响。 p

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国际体系要维持稳定，必须要有一个霸权国家或者霸主的存在。 p

与其说是霸权国家，还不如说是霸权国家倡导下的国际机制，确保着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和平。
机制的惯性 p

进一步说，美国及其西方联盟在今天国际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们参与制定的国际制度来确定和维护的；对国际制度的控制和解释，已经成为美国外交“软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p

机制的功能解释在我看来，只是一种关于国际机制的静态的理论（static theory），而不是机制变迁的动态的理论（dynamic theory）。 p

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经济理论VS现实主义的世界政治理论： p

- 1.自由主义不仅仅强调国家，同时也强调各种有组织的社会团体和公司的作用；
- 2.自由主义并不强调军事力量的重要意义，它试图寻找的是具有不同利益的各个独立的个体，如何组织起来以促进经济效率和避免毁灭性的物质破坏；
- 3.自由主义相信通过积累实现进步的可能性，现实主义假设历史是不进步的，是在权力政治的游戏中循环的。

自由主义诸流派： p

- 1.政治自由主义：多伊尔，罗塞特，“民主和平论”；
- 2.经济（商业）自由主义：罗斯克兰斯，自由贸易和相互依赖和平论；
- 3.社会自由主义：公平和国际正义对各个民族和社会重要性；
- 4.新自由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基欧汉，制度和评论。

主流国际制度研究最有力的分析工具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或者公共选择理论； p

- 1.它把相关的角色视为个体，作为全部分析的起点，个体被假定是理性的，即行为过程是有选择的，旨在根据个人的效用功能实现最大的纯收益；

《霸权之后》

2. 试图理解个体的集合是怎样作出集体决策的，以及由个体构成的组织是怎样进行互动的；
3. 强调个体的权利，以及人类事务中的进步是可能的。

成熟的自由主义认为贸易扩展导致的国际相互依赖对国际和平是重要的，但仅由此并不必然带来和平，还应该通过国际制度的力量，使相互依赖关系处于一种制度化的模式中；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也不拒绝和反对“干预主义”，相反，为了管理国际相互依赖，需要必不可少的国际制度干预力量，只不过这种制度干预力量应该受到各国之间共同协议和规则的限制，这被称为“制度和评论”（institutional peace theory）。 p

2005年版前言

国家为本国人民寻求财富和安全，并为此寻求权力。……我们需要超越现实主义这种认识，而不是抛弃它。 p

国家为促进互益性合作而建立国际机制……（国际机制）主要通过改变各种备选政策的成本和收益来影响国家政策。它们没有使自我利益失效，而是影响了对自我利益的计算。……制度化可以提供信息，提高可信性，生成聚焦点，从而减少不确定性。 p

现实主义者将国际制度视为超级大国冲突的反映，而不是国家从以功能界定的议题领域实现互益性合作的工具。 p

主要缺失： pXXV-XXVI

1. 没有提供一个国内政治与国际机制如何发生关联的理论；
2. 制度化合作中收益的分配问题；
3. 国际机制的伦理评价。

尚未解决的问题与研究方向：

内生性问题（endogeneity），制度是用权力和利益解释的，内生于制度之外，制度的影响何在？只要我们接受了制度起源和功能的理论，制度的独立解释力似乎就消失了。

回应：

1. 博弈论结果中多重均衡表明，无论是否加入观念和国内政治因素，都不存在权力与利益决定的唯一结果，制度特征可以影响均衡结果的特性；
2. 组织在制度变化后，也可以产生影响；
3. 代理理论，代理方（国际组织）在委托方施加的限制下可以施加影响。

今后的研究方向：

1. 博弈论中多重均衡表明解释合作和纷争方面做得很不好；
2. 组织及其动力机制的关注也是不够的；
3. 缺乏授权理论；
4. 国际机制的遵守问题。

它需要考察国家如何建立国际机制，如何遵守或违反其规则。同时，它需要探讨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决策如何受到它们嵌处其中的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和跨政府网络活动的影响。此外，它还需要运用当代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将国家和跨国行动的分析与国内政治联结起来。 pXXIX

第一部分 问题与概念

第一章 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合作

《霸权之后》

相互依赖导致各个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扩大国家的行动，以保护它们的公民免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
(Cameron, 1978) p4

现实主义者认为合作现象只不过是总的冲突模式的派生物而已，联盟间的合作就很容易被解释为均势作用的结果，在共享目标基础上的合作的制度化模式（除非作为更大范围的争夺权力斗争的一个部分），应该是不会存在的。 p5-6

有现实主义学者（制度主义者）把合作视为经济相互依赖世界中的本质特征，认为共同的经济利益导致对国际制度和规则的需求（Mitrany, 1975）。……成熟的制度主义者将制度理解为“被承认的、将人们的预期汇聚在一起的管理模式”（Young, 1980）。 P6

制度主义者期望在一个领域的成功合作会“外溢”到其他领域（Haas, 1958）；现实主义者则希望在美国的主导地位下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 P6

从严格的制度主义者的立场讲，由于相互依赖而出现的对政策协调的持续需求，本应该可以导致更多的合作；相反，从现实主义者的视角来看，权力的分散本应该削弱任何试图创造秩序的国家的能力。
P7

对称性合作模式——霸权的衰落并不必然敲响合作死亡的钟声。 P7

合作在互补利益的基础上是可以发展起来的，并且，国际制度（广义的定义）影响着已经出现的合作模式。 P7

历史上的各个霸权国家都是在大规模的世界大战之后才出现的。和平时期，更弱小的国家倾向于依赖霸主获得收益而不是相反。（Gilpin, 1981） p7-8

霸权国家对合作的持续展开而言，要比它在合作的一开始或者合作创设时的重要性要小。 P10

这说明合作不仅取决于彼此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还说明合作是在一种纷争或者潜在纷争的模式中出现的。如果没有纷争或者潜在纷争的模式中出现的。如果没有纷争，那么就没有合作，只有和谐状态了。 P11

从政策相互调整的意义上定义合作，而不是把合作仅仅看作是反映共同利益压倒冲突利益的状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将合作与单纯的共同利益事实区别开来。 P11

我的看法是，在这种情况下（不确定性强），必须要有制度的存在才行，这些制度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并能限制信息的不对称性。 P11

第五章利用博弈论和集体行动理论，论述即使在没有中央政府存在的情况下，合作在利己主义者之间的出现也是可能的（Axelord, 1981, 1984）。但是，这种合作的程度将取决于具有不同特征的国际制度或者国际机制的存在。 P11

国际机制对相关的政府来说是有价值的，这倒不是因为相关的政府可以强迫其他国家遵守这些规则，而是因为它们为政府彼此达成相互有利的协议提供了可能。 P11

在有限理性意识下培育的合作，并不需要各国接受共同的理想或者抛弃根本的主权原则。即使利己主义的行为者，在特定的形式下也可能同意接受这样的义务，对利益不作算计，如果他们相信，这样做从长远来说比不接受任何规则或者任何其他具有政治可行性的系列规则将会有更好地结果的话。

P12

第七章的后面两部分通过移情因素在利益判断中所起的作用，对“利己主义的自身利益”和“自身利益的概念”做了区别，从而将利己主义的假设放宽……行为者从移情的意义上将它们的利益解释为相互依赖……它们之间达成国际机制，要比那些从狭隘的利益角度定义自身利益的行为者之间更加容易……机制的规则和原则有时被认为在道德上扮演着强制的角色，而另一方面，资源的不均衡交换却常常持续作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P12

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世界政治中的合作如何才能发生？ P13

力量的不平等与相互的调整、政策的协调以及国际机制的形成是不可分割的。霸权与国际机制可能是相互补充的，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代替的，两者都可使协议的达成成为可能，并有利于促使人们遵守规则。 P14

利用国际机制促进国际合作行动的成功做法，取决于降低政策协调过程中的交易费用的努力，以及为各国政府提供信息的措施，而不是取决于规则的强制。 P15

第二章 政治学、经济学与国际体系

罗比特·吉尔平：世界政治经济学，指国际关系中追求财富和追求权力之间相互的和动态的互动关系（Gilpin, 1975）。 P17

“财富”和“权力”的概念： p18-21

财富的概念

1. 吉尔平：“财富”，任何可以带来未来收益的东西（资本、土地和劳力），它是由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包括具体实在的知识）组成的；不足：消费价值资产未考虑；
2. 亚当·斯密：一个社会中土地和劳力的年产量；不足：只指出收入的流量而不指资产的储备；
3. 卡尔·波兰伊：物资需要得到满足的手段；不足：非物质的满足；
4. 基欧汉：追求可买卖的获得满意的手段，不管是投资还是消费。

权力的概念

1. 摩根索、吉尔平：用来控制其他人观念和行动的东西。吉尔平：国际关系中不存在单一的权力等级体系（Gilpin, 1975）；马奇：基础性力量模型（basic force model），使用有形的权力资源，例如人口数量、武器质量、或者财富，去预测政治斗争的结果；不足：只能在事后得到衡量。

由那些公正无私的理想主义者为了共同的善的目的而制定和设计的国际机制，是很少的；相反，它们主要是由政府中的官员为了追求他们所说的更大的国家利益和他们自己更大的利益目的而构造的。

P21

雅各布·维纳，重商主义：

1. 财富是获得权力的基本手段，不管是为了安全还是侵略；
2. 权力对获得和保持财富是基本的有价值的手段；
3. 财富和权力都是国家政策的恰当的终极目的；
4. 虽然在特定的环境下，可能一时有必要为了军事安全的利益以及长远繁荣的利益而牺牲暂时的经济利益，但是，这两个目标从长远来说是和谐一致的（Viner, 1948）。 P22

多边贸易的一般目标当然符合所有选民的利益，但是这些选民与国务院不同，他们为了哪怕最小的暂时利益，也可能作出损害总体目标的行为（Kolko and Kolko, 1972）。 P23

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之间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源于消费与储蓄或者投资的选择形式。 P23

权力是可以被消费的，是不能被替代的。 P23

只有国家才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者，它们不但直接寻求财富和权力，而且还竭力构造使他们能够长远地达到这些目标的规则和行动框架。 P24

国家行为“由内及外”和“由外及内”的分析方法：

1. “由内及外”，单位层次分析方法（unit-level），国家对外行为根源在于内部因素；
2. “由外及内”，体系分析方法，是以体系总体上的特性为基础的。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成不变的常量而非反复不定的变量；体系理论的变量是由环境形成的（situational），它们是指每个行为者与其他行为者相对而得的位置（Waltz, 1979）。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分析是根据相对权力和相对财富的内容来确定行为者在体系中的位置开始的。 P24

新自由制度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的区别：其更强调国际制度及其实践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P25

政治学中盛行的体系分析模式来源于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理论。 P26

拉奇斯，情势决定论（situational determinism）：

不需要理解行为者的特性去解释它们的行为，因为它们面临的形势预示着它们必须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行动；如果他们是理性的话，它们将会这样做；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它们可能就不能够存在下去。 P27

变和博弈（variable-sum game）：

其中少数博弈者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中不断进行重复博弈，从而不会有一种决定性的解决方案，这就需要裁断性的力量。 P27-28

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决定与他人进行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者对其他行为者的预期以及既有制度的特性。微观经济理论并不能对战略相互依赖情况下的行为作出精确的预测（Simon, 1976）。 P28

从利己主义和理性的假设进行论证的三个优点： p28-29

- 1.使假设变得简洁，便于我们进行清晰的推论和演绎；
- 2.使注意力集中到由体系对行为者产生的限制性因素上，因为这个假设抓住了被选择常量的内部决定因素，有助于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体系的限制因素——不管世界政治经济中的权力或者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以及国际制度及其实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而不是国内政治的因素上；
- 3.使论证集中在与现实主义理论同样的基础上。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选定的条件下去创造，在直接碰到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Max, 1852/1972）。

理论贫弱却对政策寄予厚望的原因，在于人们总是尽可能使战略适应现实……具有适应性的制度建设也能够对现实作出改变，因此而培育出互相有利的合作来。 P29

第三章 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

霸权稳定论中心命题： p30

《霸权之后》

- 1.世界政治中的秩序是由一个主导国家创立的（国际机制的形成一般要依赖霸权国家的存在）；
- 2.国际秩序的维持需要霸权国家的持续存在。

金德尔伯格：要使世界经济稳定，需要一个稳定者，而且只能有一个稳定者（Kindleberger, 1973）。这意味着合作（国家间政策的相互调整）仍然依赖霸权国家的持续存在。 P30

国际机制建立以后，合作并不必然需要一个霸权领导者的存在；霸权后合作是可能的。 P31

霸权的概念界定为物质资源上的优势：控制原料、资本来源、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竞争优势。 P31

某国内部的市场越大，该国政府对关闭或开放其市场的自由度越广，那么其潜在的经济权力就越强。 P32

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必须能够自由使用关键的原料，控制主要的资本来源，维持庞大的进口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商品的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 P32

经过提炼的霸权稳定论中，霸权被定义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国家是足够强大的，能够维持管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规则，而且它愿意这样做”（Keohane and Nye），而且，国内态度、政治结构以及决策过程等因素是并重的。 P33

马奇：力量激活模型（force activation models），本质上是一种后此推理（posthoc），即发生于其后者必然是结果，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人们通过考虑为什么一个行为者不去利用所有可获得的潜在权力的原因之后，总是能够挽救这种理论所作出的判断。事实上，该修正结果是认为拥有优势资源的国家将会成为霸权国家，除非这个国家不愿意承诺去为世界政治经济承担必要的领导任务，但遗憾的是，它仍不能告诉我们是什么因素决定这个国家不愿承担领导的责任。作为一种因果理论，这种理论的用处不大，因为除非我们对其国内政治了解非常透彻，既有的权力布局是否会导致潜在的霸权国家去维持一系列规则仍然是不可确定的。 P33-34

金德尔伯格：有可能两个或者更多国家共同承担提供领导权的责任，以加强合法性，共同承受负担，以使领导权不致被别人怀疑为控制和剥削（Kindleberger, 1981）。 P36

吉尔平：一次霸权战争的结果是下一次增长、扩张、衰落循环过程的开始……国家可以在它们理解的利益概念上，学会变得更加明智和开明，使他们的行为变得更具有合作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失衡可以通过不诉诸霸权战争的手段得到解决（Gilpin, 1981）。 p36

如果把霸权重新界定为一个强大国家制定和执行规则的能力和意愿，并由此进一步认为霸权是合作出现的充分条件，那么这种表述在本质上只是同义反复。 P37

在什么样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一个霸权国家将会决定致力于规则和制度的建设呢？ P37

任何霸权理论，不仅要解释主导国家决定介入规则制定和规则执行问题，而且还应该解释为什么次级国家要服从霸权国家领导问题。也就是说，这些理论需要解释霸权机制的合法性以及合作的共存问题。 P38

霸权国家并不需要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军事上的主导者。 P38

二战后的美国霸权体系的许多关系接近“复合相互依赖”类型——多层次的议题、社会之间多层次的接触渠道、军事力量对大部分政策目标的无效性（Keohane and Nye, 1977）。 P39

《霸权之后》

霸权下和合作和霸权机制的衰落，主要关注是权力的经济根源，以及经济权力的转换对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变迁的意义。通过将经济议题从军事议题中抽象出来，我们可以更加清晰的注意到各种变迁的经济根源。 P39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的根本性力量是阶级斗争和不平等的发展；国际史是动态发展的和辩证的，而不是循环的；国家行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和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反映。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当代世界体系中，如果不在由进化模式和资本主义功能需要而塑造的资本主义背景下理解霸权或者国际制度的运作，谈论霸权或者国际制度的运作是没有意义的。 P40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生产力的进步是不可能持续很久的；矛盾是注定要出现的。这些矛盾以利润率的停滞和衰落等形式表现出来（Cohen, 1978；Fine and Harris, 1979；Mandel, 1974），但是，即使在没有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矛盾同时也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中反映出来（Habermas, 1973/1975）。任何“霸权的危机”本质上将必然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危机（Arrighi, 1982；Campen and MacEwan, 1982；Sweezy and Magdoff, 1972）。 P40

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重商主义者来说，财富和权力是相互补充的。 P40-41

沃勒斯坦竭力强调现代世界历史应该被看作是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历史。除了因为地理因素、独特的历史原因或者运气而产生的相对小的偶然事件，“世界市场力量的运作加速了差异的出现，使他们制度化，并在长时期内是不可能被超越的”（Wallerstein, 1980）。 P41

（马克思主义）很难坚持维持阶级中心的分析，因为为了解释国际事件，分析的单位转换到国家层次而不是阶级层次上……它们采用的国家中心的分析方法把阶级的概念降格到政治经济的朦胧背景之下（Brenner, 1977；Skocpol, 1977；Syivan, 1981）。 P41

列宁和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战：

列宁声称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性的，无法克服的；考茨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保持相当长时间的联合而得到克服。 P41

由国际机制的效应而培育出来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共同利益，足以使持续的合作成为可能，虽然不一定是必然的。 P42

在一个国家体系背景下所存在的不平等发展的现实，使得斗争成为经常性的，从而合作也是不完全和脆弱的（Chase-Dunn, 1981），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斗争必然发展为暴力，也不意味着能够给各方带来利益的协调努力就是不可能的。 P42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规律的分析，是依赖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国家间关系，或者为了分析未来的国际合作而推理出来的，这种分析并不是很充分和完善的。当认为根本性的矛盾存在于资本主义范围内时，这些矛盾当然会对未来的国际合作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这种矛盾的存在和特征，因为太模糊了，并不能够纳入到我得分析框架中去。 P42

考克斯的表述：葛兰西使用霸权这个概念去表述客观物质力量和道德—政治观念之间的联合，在马克思主义的词语中，则是结构和超结构的联合。在这种联合之下，通过主导集团和从属集团之间存在的一种糅合了服从和一致的意识形态，使因为对生产的支配地位而取得的权力被合理化了（Cox, 1977）。世界秩序的一种霸权结构是指，个中的权力首要的是以各方共同同意的形式而出现的，这与非霸权的世界秩序是有区别的，在后者那里，相互竞争的大国是明显存在的，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确立其主导地位合法性。（Cox, 1981） p42-43

《霸权之后》

霸权和帝国主义的关键区别是，霸主和帝国是不一样的，它不通过臃肿的政治超结构来主导社会，而是通过等级控制和市场力量运作相结合的方式，来监督各个政治上独立的社会之间的关系（Wallerstein，1974）；霸权依赖于次级国家中精英们的主观意识，这些精英们认识到在霸主意愿的下面，牺牲有形的短期利益可以获得无形的长远收益。 p43

意识形态霸权VS民族主义VS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 p43

成功的霸权领导，自身也依赖一定形式的非对称的合作。霸主扮演着一种独特的地位，为其伙伴提供领导，换取服从的回报。但是与一种帝国的权力不一样，霸主在没有其他国家一定程度同意的基础上，是不能制定和执行规则的。……霸主可能还不得不将许多资源用于国际制度的建设上，以确保它所偏爱的规则能够指导其他国家的行为。 P44

霸权与合作并不是可以互相取代的，相反，它们常常是相互的共生的关系。……合作不应该被定义为没有冲突——冲突至少是国际关系可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在纷争的事实下刺激政策的互相调整。 P44-45

第二部分 合作与国际机制理论

第四章 合作与国际机制

合作并不是与霸权相对立的，相反，霸权取决于某种非对称的合作，成功的霸主总是支持和维持这种非对称合作。 P49

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中，国际政策协调似乎是非常有益的，但是世界政治中的合作又是特别的困难。缓解这种紧张状况的一种办法，是假设国际市场的运行会自动产生最优的结果，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放弃关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有价值之类的假设（Gorden，1981）……即使一国接受合作去维持自由市场的运行，但是没有其他形式的政策协调，进一步的缺陷仍然会提出来，那就是经济市场的失灵可能会发生（Cooper，1983）。由于集体行动问题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出现交易的次优结果。 P49-50

当共同的利益足够重要，以及其他的条件都满足时，没有霸权，合作也可以出现，国际机制也可以创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机制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创设，当代国际经济机制很少是通过轻易的途径就创设起来的。 P50

规则知道的政策协调模式是怎样出现的，它们自身是怎样维持的？以及它们在世界政治中是怎样衰落的？ P51

和谐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行为者的政策（追求自身利益而不考虑其他人）能够自动地促进其他行为者目标的实现……最经典的例子是古典经济学世界中所假设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中，“看不见的手”使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自动为整体利益作出贡献……在和谐盛行的地方，合作是不必要的，甚至还是有害的，如果合作意味着某些个体密谋剥削他者的话。 P51

合作需要通过谈判的过程（即我们常说的政策协调）将各个独立的个体或组织的行动（并不是处于先在的和谐状态）变得互相一致起来。林德布洛姆把政策协调界定为：如果在一系列决策中出现调整的现象，以使任何一种决策对他人产生的消极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的次数上得到避免、减小或者抵消，那么这一系列决策就处在协调之中（Lindblom，1965）。通过政策协调过程，当行为者将它们的行为调整到适应其他其他行为者现行的或可预料的偏好上时，合作就会出现……作为政策协调过程的

《霸权之后》

结果，当一国政府遵从的政策被另外国家的政府视为能够促进它们自己目标的相互认识时，政府间的合作就会发生。 P51-52

纷争是这样一种状态，其中各国政府视彼此的政策为达到它们目标的障碍，并认为各自对政策协调上的限制因素都负有责任。 P53

林德布洛姆：操纵性的（manipulative）调整与适应性（adaptive）调整 p53

适应性调整：一个国家也许会在不考虑其行动可能对另外一个国家造成影响的情况下，按照其他国家的偏好来改变它的政策，或者服从另一个国家，或者局部地对政策作转变，以免对它的伙伴造成消极的后果；

操纵性的调整：一个行为者以一种既成事实的形势来要挟对方。

协商和谈判的确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会伴随其他一些行动，目的在于诱导其他行为者调整其政策以适应自己的目标。每个政府都追求自己所认为的自身利益，但是都希望谈判来给各方带来收益，虽然这种收益并不必然就是平等的。 P53

和谐是非政治的，在这种情况下，沟通是没有必要的，也不需要施加影响力。相反，合作是高度政治的，不管怎么样，行为模式必须要作出改变，这种改变可能通过积极性的诱因和消极性的诱因而完成。实际上，国际危机的研究，以及博弈论的实验和模拟研究，已经显示在一定的条件下，涉及威胁和惩罚以及承诺和奖赏的战略在获得合作性的结果上，要比那些完全依赖劝说和善良力量以达到合作的例子更加有效（Axelrod, 1981,1984；Lebow, 1981；Snyder and Diesing, 1977）。 P53

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相反，它显然是冲突混合在一起的，并部分说明要采取成功的努力去克服潜在或现实冲突的必要性。合作只会在行为者认为它们的政策处于实际或潜在冲突的情况下而不是和谐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合作不应该被视为没有冲突的状态，而应该被视为对冲突或潜在冲突的反应。没有冲突的凶兆，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合作了。 P54

在世界政治中，和谐在趋向消失，通过实行互补的政策而获得的收益取决于各国之间的合作。 P54

从他们（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看，相互的政策调整不大可能解决困扰着体系的各种矛盾，因为这些矛盾是资本主义固有的，而不是在没有共同政府状况下利己主义的行为者之间面临的协调问题。试图通过国际合作解决这些矛盾仅仅只是将这些议题转移到了一个更深也更加难以驾驭的层面上。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绝少例外地避免纠缠在研究什么条件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合作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上，这是毫不奇怪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研究主要资本主义强国与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外围的弱国之间的剥削和冲突关系，更加重要。 P55

实际上，近年来最富洞察力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海默明确地承认，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诸多集体行动问题，它们正在寻找至少暂时成功的可能方法去克服这些集体行动问题……资本国际化上的任何成功都可能对社会主义者的宏伟抱负构成严峻的威胁，从最低程度上讲，这种现象的发生至少会将矛盾转移到新的紧张阶段和地步（Hymer, 1972）。 P55

合作和纷争的事例可能太容易就被与它们密不可分的信念和行为的背景孤立开来。本书并不在绝对个体主义的立场上把合作视为一系列互不关联、彼此孤立的行动，而是试图去寻找理解世界政治中合作问题的模式。由此，我们需要研究行为者对未来互动模式的预期，它们对适当的经济安排特性的看法，以及它们认为是合法的政治活动的种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国际制度背景下——广义地说就像在第一章所定义的，在惯例和预期的意义上——去分析国际合作。每一种合作或纷争行为都会影响行为者的信念、规则和惯例，这些东西形成未来行动的框架。因此，每一种行动必须作为一系列这些行动、后来的认知和制度的后遗影响加以阐释。 P56

《霸权之后》

格尔兹，文化人类学：文化是“人们为他们自己创造的意义的网络（webs of significance）”，文化是“一种人、事、物存在于其中的环境，这种环境中的东西（如社会事件）能够被清晰地描述出来”（Geertz, 1973）。 P56

任何合作或表面的合作行动，在其含义得到准确的理解之前，都需要在这些相关行动、盛行的期望以及共享的信念的环境中得到解释。 P56

国际机制的定义： p57-58

1.鲁杰，“由一群国家接受的一系列相互的预期、规则与规章、计划、组织的能量以及资金的承诺”（Ruggie, 1975）；

2.国际会议定义：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所汇聚到的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隐含的明确地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原则是指对事实、因果关系和诚实的信仰；规范是指以权利和义务方式确立的行为标准；规则是指对行动的专门规定和禁止；决策程序是指流行的决定和执行集体选择政策的习惯（Krasner, 1983）。

概念解析：

1.规范，一是“以权利和义务方式确立的行为标准”理解“规范”的概念，二是通过确定一个社会体系中的参与者以道德上的约束而不是从狭隘的自我利益出发，来遵守规范而不是规则和原则，从而将规范同规则和原则区别开来，只是作为一个行为标准；

2.规范包含某些比较清楚的关于其成员合法和非法行为的禁止性内容，并在相对普遍的意义界定成员的责任和义务；

3.一个机制中的含义，很难同它的规范含义区别开来。两者在概念的边缘地区上是融为一体的。但是规则更具有专门性，它们更加详细地包含其成员特定的权利和义务。规则可能比机制中的原则或者规范更容易受到改变，因为为了获得一些既定目标，可能需要更多的一系列规则；最后，在同样特性的层次上，规则指的是程序而不是实质性的东西，机制的决策程序提供了执行其原则和改变其规则的方式。

国际机制的概念是复合的，因为它是在四个不同的内容上来定义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正是原则、规范和规则之间的紧密联系，赋予机制以合法性.....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对行为都具有禁制的含义（injunctions）：它们限定着特定的行动并禁止其他的行动。 P58-59

国际机制必须同这些国际协议区别开来.....机制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促进政府间特定的合作性协议的形成。 P61

世界政治是非集中、分散化的而不是等级制的，主权原则的盛行，意味着任何国家都不服从于一个至高无上的政府（Ruggie, 1983a），因此，由它们所构成的国际体系有时被称为是一种“自助的（self-help）体系”（Waltz, 1979）。 P61

国际机制不应该被视为构成一种“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新国际秩序的要素。重要的是，它们应该从行为者自身利益的推动下所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安排的意义上理解，因为在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中，主权仍然是一种宪法性的原则。 P62

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政治经济中，国际机制可能对那些希望解决共同问题和追求互补的目标，而又不愿将自己从属于一个等级控制体系的各国政府来说，变得越来越有用。 P63

我们把国际合作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因为政策协调的结果，各国政府实际奉行的政策，被其他政府视为能够促进自己目标的实现。合作涉及到相互的调整，而且，合作也只有在冲突或者潜在的冲突状态中才能得以出现.....国际机制是由各个层次上的禁制内容组成的，这些禁制内容从原则到规范具有高度专门性的规则和决策程序不等。通过研究一段时间一项机制的规范和规则的演变，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机制这个概念去研究世界政治经济中的连续性和变化性问题.....国际机制可以被看作

是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例如国际权力配置和国家与非国家行为者的行为）中间的调节性因素（intermediate factors），或者是“干扰性的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s）。国际机制这个概念有助于我们解释合作和纷争问题，要理解国际机制的影响，并不必然需要对世界政治中的行为者持理想主义的假设。相反，机制中的规范和规则能够对行为施加一种影响，即使它们并不体现共同的理想，但是它们被那些关心自身利益的国家 and 公司不断用于相互的政策调整过程中。 P63

第五章 理性选择与功能的解释

低水平的合作可能仍然是帕累托最优的；也就是说，在行为者既有利益不变的状况下，可能没有一种合作性的解决方案能够使他们的利益变得更好。 P65

博弈论和集体行动的研究强调，那些理性的个体尽管可能从合作中获益，但它们可能不愿意去这样做。因为诸如此类的原因，它们不大可能协调它们的行动以达到想要达到的目标，即使它们作为个体是理性的，但是它们所属的集团可能并不必然会作为理性的行为者来行动。显然，根据纷争的事实推断存在冲突的利益，而对这种所谓冲突的利益又没有获得直接的证据，会冒着犯严重错误的风险（Hardin, 1982）；况且，行为者即使在它们的利益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情况下也可能无法进行合作。 P65-66

作为世界政治中最主要的行为者，国家是理性的、利己主义的……利己主义的假设意味着世界政治中的行为者偏好是基于它们对自己福利的估算。理性的假设声称，行为者是“寻找在一系列连续的有排序的目标中将它们的价值最大化”（Snyder and Diesing, 1977）。 P66

托马斯·谢林：混合动机博弈（mixed motive games），是由一组“互相依赖和冲突，以及伙伴和竞争关系”刻画的（Schelling, 1960/1980）。在这种博弈状态中，两个博弈者可以通过相互的合作获得收益，但是每一个博弈者都可能从背叛行为中获得比其对手更多的收益。

完全冲突博弈：其中纷争的出现是由于利益的结构所决定的；

合作性博弈：只有戏剧性的坏运气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阻止合作。 P67-68

奥尔森（Olson, 1965）：集体行动逻辑，在需要集体行动的状态中，合作对获得一种为所有相关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时必要的，不管这些成员是否为这种物品的供应做出贡献。当每一个成员为供应这种物品所承担的成本，与总的成本相比非常小的时候，利己的个体可能会作出估算，认为他们如果不作贡献的话会好一点，因为他们的贡献对自己来说是有成本的，而其贡献对这种物品最终被生产出来却只会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因此就像在囚徒困境中的一样，对一个利己主义的个体来说，占优势的策略是背叛而不是对这种物品的生产做出贡献。这种估算会产生这样一个结论，也就是集体物品不会被生产出来，或者处于供应不足的状况，尽管事实上这种物品的价值对这个集团来说要大于其付出的成本。 P69

（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警告我们要反对合成推理谬误，这种推理在世界政治中会导致我们相信纷争的根源肯定存在于行为者的本性而不存在与它们之间的互动模式中。相反，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都告诉我们华尔兹所说的“第三种设想”的解释力量，这种解释将因果关系归因于国际体系的特性而不是国家内部的特性（Waltz, 1959）……即使在行为者相互之间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世界政治中的信息和沟通的障碍也可能阻碍合作的实现，并导致纷争涌现。 P69-70

韦伯：“为了渗透到真正的因果相互联系的关系中，我们需要建构起非真实非现实的东西”（Weber, 1905/1949），这是一种“历史的逻辑分析”途径。基于理性的利己主义假设而建构起来的非真实的预期，有助于一种因果分析，它不会使我们一定要持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理论的假设必然是真实的、现实的。 P70-71

理性选择理论的三个可能的曲解： p71

《霸权之后》

- 1.我们可能不太容易地去假设，行为者的决定具有一定的自愿意义，因此会冒忽视行为者之间权力不平等性的风险；
- 2.将利己主义的假设等同于关于个人在社会中地位的个人主义假设（atomistic assumption）；
- 3.理性可能会与利己主义混淆起来。

霍布斯：唯意志论，在自然状态中，达成的免于恐惧的契约是具有强制性的，“甚至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我被迫允诺付与赎金而从强盗那里赎身出来，在民法没有为我解约之前，我就必须付与”（Hobbes, 1651/1958）。因此在自然状态中（霍布斯断定是一种人人相互拥有主权的状况），既然我已经理性地作出选择，去保持诺言，我就受到在强迫状态下作出的诺言的束缚。 P71

在分析国际合作的过程中，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要区别国际机制形成过程中的两个层面：强加的限制因素和决策。像地理之类的环境因素，以及强有力的行为者，都会施加限制因素；机制可能多多少少也是强加的，也就是说，决定加入机制可能多多少少受到强有力的行为者的限制（Young, 1983）。 P71-72

世界政治中权力和依附的关系，将因此是决定国际机制特征的最重要因素。行为者的选择将会受到这样的限制，那些最强大的行为者的偏好将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因此，在将理性选择理论运用到国际机制的形成和维持的分析中，我们不得不对协议产生的结构给予持续的注意。自愿的选择并不意味着环境是平等的，在解释结果时，事先存在的限制因素也许比选择过程本身更加重要。（需要一种限制—选择的分析途径） P72

虽然国际机制也许对其创立者来说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些机制并不必然就会提高这个世界的福利。就事实而言，机制本身并不就是“善”的东西。 P73

在康德道德律令基础上对组织作出贡献的行动，促进着个人对于共同的善的认识，哈丁（Harding, 1982）就把这种行为称为“超理性”（extrarational）的。 P75

艾克斯罗德（Axelrod, 1981）：当未来的回报是有足够价值的时候，“一报还一报”（tit for tit）战略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都是很得势的战略，艾克斯罗德揭示出的这种博弈战略从技术意义上讲是很有力和稳定的。采用这种战略的博弈者意味着它一开始就采用合作战略，然后不管其对手在最后一步究竟采用什么战略，它都坚持对背叛行为进行报复，对合作行为给予回报。当两个博弈者都使用“一报还一报”战略时，相互彻底的合作就会出现。艾斯克罗德指出，即使在完全的利己主义者中间，如果有足够多的潜在的合作者在一开始存在，那么合作是能够出现的。 P76

奥尔森论证说，小集团可能具有特殊的利益，它们可能愿意提供这类物品，或者因为单方面这样去做符合一个行为者的利益，或者因为一群小数量的个体，它们能够相互监管彼此的行为，互相在战略上作出反应，从而能够去提供这类物品。后一种状况与重复囚徒困境博弈状况是类似的：当决定供应这类物品不只是一次而是一段时期内多次进行的时候，这可能有利于合作，因为不这样的话，其同伴可能可能采取背叛行为从而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在涉及集体物品以及囚徒困境的状态中，战略的互动过程是能够培育合作的。 P77

即使没有霸主的存在，小数目强有力的行为者也可能一起完成这个任务……奥尔森的理论中，并没有排除在少数行为者中间出现的寡头共谋现象，其中每一个行为者都对其他行为者的行为进行相互的监管并作出反应，从而使合作成为可能。 P78

集体行动的逻辑将导致组织试图将它们所追求的物品进行私有化的倾向。 P78

本书使用的理性选择分析，并不强化传统的认为世界政治中的合作非常稀少的观点，我们的分析强调说明的是，即使在完全理性的、从狭隘的自身利益考虑出发的政府之间，合作也是可以获得的，这种

《霸权之后》

分析并不因为对共同的善的理想关心，或者对一种国际关系模式的意识形态承诺而动摇。也就是说，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能够得到激励去形成国际机制。 P78-79

不管是否存在霸主，国际机制的形成取决于共同的或者相互补充的利益的存在，这些利益要能被政治行为者所意识到，从而使共同的生产联合收益的行动是理性的。一个霸主也许会通过提供合作的报酬和对背叛行为的惩罚，帮助创造共同的利益；当不存在霸主的情况时如果有条件的话，同样的报酬和惩罚也会被提供出来，这种结果一定是由相对小数量的行为者所决定的，它们能够监管彼此对规则和惯例的遵守情况，并使其他政府的福利取决于对协议和谅解的持续遵守。 P79

新的国际机制的创设也许由旧机制所培育出来的相互信任感而得到促进。机制很少是从混乱中出现的，相反它们是相互依靠的。因此，我们应该对机制演变与机制是无中生有的创设问题给予同样多的关注。 P79

机会成本是由行为者的特征和环境的特性决定的。在理性选择分析的框架下，制度影响着选择的背景以及各种可能行动的机会成本。因此，在利用理性选择去分析制度问题时，我们立刻会走向一种功能的论述途径上。根据这种分析框架，“如果理性的人创设和维持制度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或者获得社会目标的话，制度就是具有功能作用的”（Simon, 1978）。 P81

一般来说，功能的解释可以从造成影响的意义对原因进行说明，也就是说，“被解释事物的特征是由其对所要解释事物的影响来决定的”（Cohen, 1978）……社会理论中的功能解释框架下……一般来说在本质上是“发生于其后者必然是其结果”的推理逻辑……制度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本应该有理由被期望去增加其创造者的福利的。 P81

从这个角度将，潜伏在功能解释背后最大的危险，是一种后此推理的谬误，就是制度可能被解释成为它们是因为原本一定能够扮演的功能作用而兴起的，而这些制度实际上可能只是因为很偶然的原因才出现的……避免这种谬误的一种办法，是要说明被研究的个体是理性的，以及被解释的制度和社会惯例是被设计用来完成预期效用目的的。在这种办法中，效果能够解释原因……另外一个受欢迎的克服这种逻辑谬误的办法，是要说明这些不能完成专门功能需要的制度和惯例最终是会消失的……不然，效果是不大可能解释原因的，理解国际机制的功能将不会有助于它们所以产生的理由。 P82

市场失灵：阿克洛夫，“次品市场”（market for lemons），“质量不确定性”（quality uncertainty），问题不在于行为者（假设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自身的弱点或者缺陷，而在于整个体系的结构和制度（Arrow, 1974）。体系特有的特征所强加的交易成本（包含信息成本），对行为者之间有效的合作制造了障碍。 P83

第六章 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

科斯定理：单单外部性因素的存在并不必然会阻止各个独立的行为者之间有效协调的出现……在一定的条件下，不考虑法律责任的规则，这些行为者之间的谈判能够导致帕累托最优解决方案的出现。 P86-87

科斯定理经常被用来说明没有中央权威的情况下谈判的功效问题，有时它也被专门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中（Conybeare, 1980）……科斯定理可以作这样的阐述，它预测了国际关系中的集体行动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相互调整而得到克服，也就是说，通过我们所定义的合作的途径。由此得出的进一步的含义是，我们看到的纷争现象一定是本质上利益冲突的结果而不是协调的问题。 P88

科斯定理的三个条件：确立行动责任的法律框架，假设法律框架是由政府权威来支持的；完全信息状态；零交易成本（包括组织成本和制造补偿性支付的成本）。 P88

机制的建设者们预期机制将促进合作。在这个建构起来的功能的论证框架中，这些预期解释了机制的形成：预期到的机制效应解释了建立这些机制的政府的行动，各国政府相信，在没有一个国际机制框架下达成特定协议的专门努力，与在一个机制框架下达成的协议相比将是收效甚微的。 P89

国际机制更像费勒纳（Fellner，1949）在分析寡头垄断公司时所探讨的“准协议”而不像政府。这些准协议在法律上是不可强制实施的，但是就如契约一样，它们有助于以相互有益的方式组织行为者之间的关系（Lowry，1979）。机制还类似准则，也就是在一个共同体中被视为共同知识的惯例，行为者所以遵守它们，不是因为它们是独一无二的、最好的，而是因为其他人也遵守它们（Hardin，1982；Lewis，1969；Young，1989）。这类安排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被设计出来不是为了执行对协议的集中化实施，而是建立关于其他人行为模式的相互的预期，以及发展使各方将它们的惯例或者行为调整到一个新环境中的有用的关系网。契约、准则以及准协议提供着信息并形成交易成本的模式：违反承诺的成本增加了，而在这种框架下的行动则成本降低了。 P90

在谈判中经常使用的，并且还和欧洲共同体和其他一体化理论有关系的“外溢”这一术语，也可以视为对补偿性支付问题的重视。这方面的著作告诉我们，一项一体化的政策安排，能够期望被进一步扩展到其他议题领域之中，使潜在的补偿性支付领域变得更加广泛，从而促使成员间一致意见的达成（Haas，1958）……我们认为国际机制影响着交易成本。一项潜在协议对其可能的参与者的价值，部分取决于它多大程度上与包含在国际机制中的合法性原则相一致。破坏这些原则的行为，其代价将是高昂的。机制还影响官僚政治中的交易成本，成功的机制通过对议题的组织，使富有成效的议题联系战略（促进与机制原则相一致的协议的产生）得到加强，与此同时，使与机制原则不相一致的具有破坏性的议题联系战略和谈判受到阻止。 P93

关于市场失灵理论的文献，论述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在没有合适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一些相互有利的谈判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协议难以达成的重要根源：不对称信息，道德风险，以及不负责任的行为。 P93-94

不是所有的沟通行为都能减少不确定性的存在，因为由于欺骗的缘故，沟通可能导致不对称和不公平的谈判结果。 P94

进入一项国际机制所需要的信息，并不仅仅是关于其他政府的资源和正式谈判地位的信息，而且也是关于它们未来地位的准确信息，后者部分也是对将来能否信守承诺的估算问题……国际机制通过提供足以衡量别人表现的行为标准，将这些标准与特定的议题联系在一起，提供公开讨论的论坛，而且还经常借助国际组织，作出评判，来评估别人的声誉。 P94-95

从旁观者的视角观之，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公共物品和搭便车问题的一部分；但是，从试图确定是否可以依靠一个可能是潜在的不负责任的伙伴的视角看，这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不管如何，信息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都可能阻止相互有利的协议的产生。 P97

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论证并不相应地认为国际机制必然会增加全球福利，国际机制既可以被用来寻求排他的和地方的利益，也可以用来追求更加广泛的共同目标。我们也不应该认为，所有潜在的有价值的机制将必然会被制定出来。就如我们看到的，那些承诺提供全面的可观的收益的机制，可能是很难创制出来。 P98

国际机制是分散性的制度。这里说的分散并不是说机制不具有为成员遵守的机能，而是说对违背机制原则或规则的任何制裁，都不得不由单个的成员来执行（Young，1979）。机制所提供的程序和规则只是把这种制裁协调起来。机制原则和规则的分散型实施既缓慢又不确定。但在许多场合，规则都被遵守。 P98

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国家利益这个概念是否被短视地定义，而没有考虑破坏国际规则和规范对其

他议题或价值的影响，或从更加长远的意义上讲，没有考虑破坏国际规则和规范对其他国家目标的影响？然而，最关键之处在于如何精确地定义利益，以及国际机制如何影响国家对自我利益的界定。对遵守问题中这些困惑现象的理解，需要我们考察国际机制如何影响理性的、利己的各国政府对自身利益的估算……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从以下两个不同的但又相互关联的论证途径来进行。一条论证途径是孤立地看待某一机制，考察它相对其他可行性选择而言对政府的价值。对遵守中存在的困惑现象的这类解释，首先要强调的是建设国际机制的困难。由于机制建设起来很难，所以如果对其他方案选择的结果导致既有机制的崩溃，那么遵守机制中的规则才是理性的，因为即使一个不完善的机制也会比任何政治上看来是可行的替代机制要优越。另一个论证途径是把机制置于世界政治中其他机制的背景之下，把每一议题和机制网络中的一部分。正如重复囚徒困境与一次囚徒困境的结果截然不同一样，把一个机制放在其他机制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就能得出与孤立考察这一机制所截然不同的激励结构。 P100

威廉姆森，认为一个集团成员之间的沟通有助于促进合作，或是他说的“对集团目标的信守”（Williamson, 1965）：高水平合作和低水平合作是两个平衡点，一旦达到某一平衡点，只有环境发生重大变动时才能使这种平衡有所变化。 P101-102

斯丁库姆（Stinchcombe, 1968），积淀成本，当一个过去的行动产生一项持久可用的资源时，我们就把这项资源视为“积淀成本”，例如对于名望和善意的投资，或者我们可以加上对制度（如国际机制）的投资，是无法挽回的，因此“不应该被纳入到对当前理性政策的估算之中”。但是“如果这些积淀成本使得一种传统的行动模式的支出更加便宜，而且如果新的行动模式在不计这些资源的情况下并不更为有利可图，积淀成本的作用就会使传统行动的模式年复一年地存在下去”（Stinchcombe, 1968）。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机制具有积淀成本的意义，这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即使所有的成员宁愿倾向于支持一些不同的原则、规则和制度时，既有的机制仍然能够存续下去的理由。 P102

即使当自身短视利益提醒自己不要去执行国际机制时，利己的政府出于对声誉的考虑，并且因为害怕报复以及形成坏的先例，它们仍然会遵守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原则。正如我们在这一部分所看到了，它们可以严格地按照成本和收益的估算原则去行事；每次当它们有破坏国际机制条款的冲突时，它们会考虑这么做对自己声誉的影响，以及遭受报复的可能性和破坏规则可能对整个系统所产生的影响，从而计算这么做所获得的收益是否高于付出的代价。在这种成本—收益分析的影响下，它们常常决定去适应各种规则，理性的利己主义原则使各国政府不仅可以达成协议，而且还能使它们履行协议，哪怕协议可能根本不起什么作用。 P106

政府决定加入机制，部分是在罗尔斯讨论社会契约问题时使用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背后作出的（Rawls, 1971；Sandel, 1982）。当然，各国政府比罗尔斯所谓的处于“无知之幕”阴影背后的个人，对协议条款可能给它们带来的好处知道得更多，但毫无疑问，它们与这个阴影背后的个人一样，也不能完全精确地预测未来。 P107

对人类生活现实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尊重，要求我们承认纯粹最大化的理性假设是不完全符合现实的。尽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理性的假设对于国际体系层次上的理论构建是非常有用的，但是近期没有任何一项决策研究的结论告诉我们：现代政府视根据纯粹理性的教条来行事的（Snyder and Diesing, 1977）。与其他大型组织相比，政府并非更多地按照古典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来行事（March and Simon, 1958）。因此在下一章，我们通过引入“有限理性”和“满意”原则这两个概念，来调整关于理性的假设。 P108

第七章 有限理性和自我利益的再界定

西蒙：有限理性理论

区分两种理论尤为重要：一种是将所有的条件和限制都归因于理性行为者之外的环境；另一种则认为局限性主要来自于作为信息处理者的行为者本身。后一种关注行为者信息处理能力的局限性的理论，

《霸权之后》

我们称之为“有限理性理论”……[在新的新古典理论中]并非因为决策者心理上的特性，而只是作为技术性环境的一部分，才引进信息的限制和成本问题。因此，这些新理论丝毫未能缓解决策者所面临的计算的复杂性问题，它们把决策者视为通过简单的夸张与扩大，而不是通过大致的估算、简化和满意原则来处理复杂的计算问题的。这样一来，它不仅需要计算供需曲线的形状，而且，还要更为精确地额外计算出这一计算活动的成本和收益。对于不确定性及信息传输等许多迄今仍为所忽视的问题，有人认为这些新理论提供了解决方案，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一种幻象而已（Simon, 1979）。在西蒙的理论中，人们与其说是谋求利益的最大化，不如说是获得“满意”。也就是说，起初他们通过搜寻来节约信息，直至他们找到了高于满意程度的——即所期望的程度——行动步骤为止。随着对新的环境信息的获知，人们的期望程度也不断变化（Simon, 1972）。 P111-112

奥斯汀（John.Austin）在一句格言中对规则功利主义（rule-utilitarianism）下了这样的定义：“规则随功用而变，行为随规则而变。”（Mackie, 1977）功利主义者坚信，总体而言，与每次根据“首要原则”（first principles）作出的一系列特别决定相比，遵守规则——约翰·密尔称之为“次要原则”（secondary principles）——将带来更佳的结果。人类计算能力的局限性是制定和遵守规则的主要原因。 P113

在理性选择的假设下，由于国际机制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尤其是它能减少外部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从而对政府具有重大价值。机制的存在，能使每一个政府更好地预期对方是否会采取可预见的合作政策。依此理论，政府不再对每一个事件都精打细算，以使其短视的自我利益最大化。放弃这种行为所得到的回报是，它们对他国行为的预期变得更为确定了。 P114

国际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限制强势国家从这种局势中获利的能力（无论多么短暂）。这种限制所带来的好处绝非是某些国家的利他主义行为所致，而是因为机制使各国对自身长远利益的计算发生了变化。如果一个政府珍视其在未来与别国达成协议的能力，那么声誉就成为一个关键因素。 P115

在经济领域，偏好或“喜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外生变量（Stigler and Becker, 1977）。但是马奇（March, 1978）指出，理性选择既包含对自身未来偏好的猜测，也包括对现实行为将导致后果的估计。个体总是试图改变自身的未来偏好——不论是通过弗洛伊德式的对欲望和冲动的压抑还是升华，抑或借助于其他手段。 P115-116

具有不同偏好的继任政府都可合法地对这些公共项目加以修改，尽管在实际操作中这是很难或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一旦国内政策成为国际协议的一部分，再要加以修改就会困难得多，继任政府必须遵守历届政府签订的国际协议，否则就要冒遭到国际报复的风险。 P116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强调国际经济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不公平性，这也正是其理论的力量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到，那些奉行国际主义政策的政府所追求的开放政策，创造了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模式，这种模式一旦被破坏，代价将极为高昂，从而束缚了后继的社会主义政党或者民族主义政党政府的手脚。即使民众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为优越，当国际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之时，民众将不愿意社会主义政党上台执政，担心因此会造成经济混乱……保守主义的前任政府与其资本主义盟友共同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机制，可能有力地阻止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P118

通过对未来政府的行动自由加以限制，国际机制可以影响其偏好。显然，没有人能保证这就是“好的”，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个人对未来的偏好。但是从任何现任政府的立场出发，这确实是国际机制的一大功能。 P118

汉斯·摩根索曾宣称外交政策的终极目的可能源于法律与道德原则。其论述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非认为理想主义观念对决定目标无足轻重，而是认为权力是外交的必要手段，所谓“即时的目标就是权力”，因此，在外交政策分析中可以将理想因素忽略不计（1948/1966）。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这种论调的缺陷在于，权力的形态绝非是单一的，对“权力的追求”也形式各异，其特点部分取决于行

《霸权之后》

为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Wolfers, 1962），同时也取决于施加影响时的具体情境（Baldwin, 1979）。在论及外交目标时，沃尔弗斯认为国家有时会遵循自我克制的政策，即“视国际团结、法治、诚实或和平高于国家安全和自我保存这样的目标”（Wolfers, 1962）。 P119

国家间利益和相互依赖的四种情况： p120-121

- 1.行为者对他国的福祉无动无衷（纯霍布斯式的世界）；
- 2.行为者只在必过行为会影响自身的情况下才关注他国福祉。我们把这种情况下的利益称为工具性相互依赖（instrumentally interdependent）下的利益；
- 3.行为者不仅处于工具性原因而关心他国福祉，而且因为不论别国如何行动，其收益的增长也会促进自身的福祉，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各行为主体间的利益属于情势性相互依赖（situationally interdependent）；
- 4.行为者纯粹为他国的利益而关注其福祉，即使这样做对本国物质利益和安全毫无裨益，被称为移情性相互依赖（empathetic interdependent）。

本书中“利己主义”所涉及的利益概念均为独立的、工具性的情势性的相互依赖状态下的利益。放宽利己主义的假设意味着承认，世界政治中的国家及其他行为者有可能重新定义其利益，以实现移情性的相互依赖。这种变化将对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国家将更倾向于获取更大的双赢结局——已能够带来更大的总体收益的方式解决国际问题——即使其直接收益可能会有所损失。当它国受益时，它们也将从中获益。共享的利益将因此进一步扩大，从而有可能达成至少相等也许会更多的互利协议。

P122

我们将考虑的两种行为模式，似乎很难从利己主义的立场来加以解释，它们分别是世界政治中覆盖在规则表面上的道德主义面纱，以及曾长期存在的不均衡的交换关系。 P123

哈特（Hart, 1961）：法律不需要以道德体系为基础，但可以通过长期自我利益的计算或其他原因而得以维持。 P123

即使规则并无任何道德效力，仍有可能得到利己主义行为者的遵守。因为违犯规则不仅将破坏一系列互惠安排，而且会背上违约的恶名，损害其未来订约的能力。 P124

只有谨慎是不够的，对长远自身利益的理性计算本身，并不足以导致互惠协议的达成，即使达成了协议，也将难以维系，道德的主要内容——不论其具体形式是什么，就是义务观念的实践价值，或是一种无形的相当虚幻的联系和纽带：它可能是对任何成约都需遵守的普遍要求，也可能是各种特定的义务，如军事荣誉，对组织或对同志的忠诚等等（Mackie, 1977）。 P124

萨林斯，互惠的三种形式：

- 1.消极性互惠，通过欺诈或必要时使用暴力，从而牺牲他人利益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 2.对等性互惠，以等价物的即时交换为特征，这种互惠以实现双赢的贸易为基础，较之消极性互惠，它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交换关系更为相似。国际机制可以被部分地视为一种促成“非即时性”交换的安排。在原始部落中，“一种不平衡的贸易措施维持着贸易伙伴间的关系，从而驱使着下一次交易的完成”（Sahlins, 1972）；
- 3.普遍性互惠，在交易中，存在着持久的单向物流，萨林斯将之称为“公认的利他主义”（putatively altruistic）：施与而不求回报，对互惠的期望是不确定的、模糊的。接受赠与只是产生了一种“松散的互惠义务，只有在赠与人需要时，以及/或者受赠人有能力时才要求回报。无力酬报并不会引起施惠人停止赠予，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资源始终单向流入受惠方”（Sahlins, 1972）。

国际机制之所以改变，不是因为国家所宣称的客观利益发生了转移，或是由于权力分配的更动，亦非因为政府所面临的制度化条件发生了改变，而是由于人们利益观念的改变——即由于行为者的学习所造成的……“行为者之间处于变动之中的价值与利益概念，是与其已经变化了的行为相联系的，尽管

《霸权之后》

它并不符合观察着所责难或强加的任何理性模式。没有一成不变的‘国家利益’，也不存在什么最优的机制”（Hass，1983）。 P129

第三部分 实践中的霸权与合作

第八章 战后时代的霸权合作

用葛兰西的话来说，，这种一致被视为美国的伙伴对其意识形态霸权的接受。次级国家的领导人相信，他们可以从正在建立的体系中获得利益，这种信念又推动他们接受美国的领导。因此，人们认为，在美国与其盟国之间存在高度的互补性。美国旨在通过创建不但能减少不确定性和鼓励合作，而且也能使其伙伴获取特定利益的国际机制来加强这种互补性。 P137

霸权的力量，以及以霸权国的条件建立起来的国际机制共同推动了合作。霸权本身降低了交易成本，减少了不确定性，因为每一个盟国都能与霸权国家开展正常交往，并希望霸权国确保该体系的整体连续性。国际机制是按照霸权国能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行为标准来建构的，从而确保其合法性。 P137

美国领导人所建立的霸权机制，并非是仅仅通过指挥比它更弱小的伙伴按照规定的方式行动来实现的。相反，他们必须在双方之间寻求共同利益，而且，在要求伙伴和他们保持一致时，他们本身也必须作一些调整来相互协调。要建立这种制度，他们必须运用其权力资源。在这个过程中，也会遇到许多挫折。 P137-138

世界政治经济两个关键问题：贸易与货币。（石油） p139

美国可以利用欧洲依赖其援助这一点而获得影响力，从而在创建并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一系列世界金融体系规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当然，这些规则必须考虑政治和经济的现实状况。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规则既不能仅仅由美国制订，也不会建立了就能被执行，相反，要保持控制制订规则的过程，需要慎重地和连续不断地将干预和协商结合起来。 P142

首先，虽然从政策的相互调整来说，合作是可以实现的，但这个实现过程并非是一个和谐的过程。合作产生于纷争的预测之中。其次，在这个事件中，合作的困难性部分反映了这样一种状况：即缺乏一致同意的制度，以建立一个足以交涉的框架。 P155

霸权与合作的相容性再次表明，国际合作并不依赖于国家间完全的平等。强调“国家间的不平等”（Tucker，1977）并不就是否定政策相互调整的可能性，虽然这可能意味着强国与弱国所作出的调整将是不同的，也是不均衡的.....霸权的统治的建立先于经济利益的分配。 P156

强制性石油进口计划并不构成一种合作努力，相反，它是对可能需要美国作出更大调整的国际协议单方面代替。它反映的问题是，即使是处于美国优势的时期，美国国内政治的制约也会阻碍霸权合作。与假定的更好的政策相比，当强制性石油进口计划耗尽美国国内石油供应时，它损害了美国的实力。因此，该计划产生的效果，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的，因为美国拥有用于交换以获取敬重的多余资源越来越少，而新的、霸权后的合作模式还要过一段时间才出现。 P171

霸权合作的经历促使我们在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时考虑三个更普遍的问题：权力与相互依赖之间的关系；维持霸权的问题；以及霸权与国际机制和合作之间联系的性质问题。 P171

为了保证长期的成功，一个霸权国的战略必须为其自身的生存不断创造条件，对一项战略的追求必须要能创造力量，否则霸权就将崩溃。因此，任何霸权领导战略必须寻求维护政府影响和领导地位不可或缺的国家资源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并非由于美国领导人对国际合作的态度

，而是由于他们在面临国内政治阻力时不能执行其优先政策。 P173

也许在美国的霸权时期，它所提供的最重要的集体物品，就是未来行为模式持续增加的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是由霸权带来的。 P174

第九章 霸权机制的不完全衰落

就其本质而言，国际能源机构的机制是一种保险性机制。换言之，它的建立并不是为了控制原油市场，而是希望通过建立内部程序来分担石油供给中断的代价，减少个别成员国的风险。风险机制的建立不仅将降低成员国应付危机的脆弱性，同时还可以防止被对方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从而提高集团的整体战略地位。在霸权衰落的情况下，人们会期望类似国际能源机构这样具有紧急共享体系的保险机制的诞生。 P189

考虑到各个问题领域的差异，任何理论，如果它试图解释60年代至80年代之间国际经济机制发生的变化，都必须对这一事实作出解释：即为何是石油机制发生了最为重大的变化，而其次才是货币和贸易机制；同时还必须解释似乎存在着一个相当复杂的普遍模式，很明显地横亘与各领域之间。一方面，由于机制规则在许多方面变得模糊，仍旧清晰的规则更频繁地遭到破坏，旧有霸权机制已然式微；但另一方面，非全球性、自由主义取向的政策协调也始终未曾中断，避免了螺旋式崩溃的发生。在某些个案中，这种努力导致了新国际组织的出现。 P190

在世界政治中，权力永远是重要的。任何试图对某一给定的程序和互动模式加以评判的功能性解释，必须植根与对政治结构的理解，尤其是行为者之间权力分配的理解（Waltz, 1979；Keohane, 1983；Ruggie, 1983）。当结构发生急剧变化，植根于其中的程序和制度也必将随之改变。 P200

霸权稳定论解释货币机制崩溃的三个不足： p201-202

- 1.首先，它以有形资源的变更作为变化的先兆，但是，美国维持机制的最重要的能力并非源自对有形资源的占有，而是在于其处理国际金融事务信心这一象征性资源；
- 2.未能认识到美国权力地位的双重性质。一方面，美国的权力地位遭到侵蚀。但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美国的弱点是由旧有机制的规则人为造成的；
- 3.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权力资源的指数，从而导致对机制崩溃的预言失当。

在世界政治中，合作既可能是自我增强的，也可能是自我限制的。如上所述，一个也已存在的货币机制使保持合作更为容易。但是，这一机制又使美国没有必要调整政策以防止其崩溃。机制的稳定性反而限制了合作的深入发展。合作常常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出现，但这并非说合作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合作产生于实际和潜在的纷争，那么如同1973年至1974年石油危机所引起的严重的纷争，也许就是促进国际合作大踏步前进的必要条件。国际机制试图维持合作模式，但在面临危机和变化时，却未必真能促使合作发生革命性的扩展。 P203

如果存在国际剥削，则必将导致纷争；而如果各方都寻求合作，也存在达成互惠协议的可能性。正是在此基础上，合作才得以形成。有时也的确存在着恃强欺人的情况，这提醒我们注意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并非是决定论的，而是霸权稳定论又一有所保留的翻版。尽管对于谋求订立协议的国家，机制能促进其合作，但是在利益相互冲突或是要求过于苛责的国家之间，合作也不会由机制自动产生。 P206

第十章 消费国石油机制（1974—1981）

对于非霸权机制形成条件的预言，在可资验证的事实出现之前便已作出，这使我有可能会预先排除某些不利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我对霸权的预测或者我的合作理论有可能被证伪。 P211

唯一能推翻我的理论的条件就是我对未来权力状况的估计成为现实——即霸权就此消失，无法恢复。

《霸权之后》

这样合作的条件便将成立，而如果在霸权之后根本没有出现合作，则我的理论讲不攻自破。各国将以螺旋形不断下降的形式卷入货币战和贸易战，重新奉行损人利己的政策，这一切只会证明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点，而非我的合作理论。再者，如果合作总是在“错误的地方”出现，也将证明我的理论是错误的。例如：我主张合作应以少数大国为中心，而由大量的小国追随其后。如果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由小国主导的联合国，或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形成一种“集体自立”战略，便将与我的理论背道而驰。同样，如果合作不是发生在长期保持互动的议题领域，也将于我不利。最后，如果大多数政府间协议不是在国际机制框架内达成的，而是远离现存机制，建立在各异的基础上，或是发生在此前并无国际化网络和制度存在的议题领域，这些都将构成对我的理论不利的例子。 P212

在不存在霸权的情况下，各国政府有可能为获取双赢合作而进行合作，而机制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促成合作，如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信息，订立粗略的概测规则，以便于政府官员日常决策。但是我无意断言这一切肯定会发生，更不要说认为它会自动形成。如果这一论述是正确的，那么主权原则就不足以妨碍能源合作的形成。合作不应该是等级秩序的压力下强制形成的，而应该通过对规则的尊重，或者借助非正式的协商来促成各国政府达成合作协议。 P213-214

各国从规则中获利，同通过强加和实施这些规则从而借助国际组织限制政府自由权二者毫不相关。在政治上，实施定量指标的主要意义并不在它对各国的石油进口形成限制，而是在于创造了一种环境，在其中政府间合作才得以发生。 P224

在“后霸权”的世界格局中，无法通过建构中央集权式的国际组织，以使国际机制的规则得到可靠实施。如果我们将国际机制以及国际组织视为一种等级体系或准政府，那么其效率必将十分低下软弱。国际机制作用的发挥并不仅仅取决于它们的法定权力，还取决于其内部所形成的非正式协商的模式。规则作为使合作合法化的象征，或是用来指导合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合作需要独立的行为者不断地调整相互间的政策，这是无法靠等级制权威来强制实施的。 P227

只要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中基本现象而不是过时的现象，那么希望通过国际组织，运用集权方式以使规则得以实现就只能是一个空想。（Hoffmann，1966）

实际上，对这个概念作“无政府状态”和“等级制”的二分法本身就是误导的。持这一观点的人忽视了世界政治中非等级制的协调，误把国际制度和机制当成软弱的按等级原则构成的政府。正如本书所强调的那样。机制的重要性在于促进政府间协议的达成，而非集权式的强制实施者。 P228

这些机制不但需要具有潜在的共同利益模式，还需要一个充分有利的环境：通过使交易成本最小化，减少不确定性，为政府的行动提供粗略的概测规则；国际制度的确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使事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际机制不能像强有力的霸权那样创造秩序，但国际机制却可以促进对成功的自我实现的预期，从而远离恐慌和失败。 P230

第四部分 结论

第十一章 制度的价值与多变的代价

国家道德学说，“国家而非个人是国际道德的主题”，“国家间经济关系的结构和行为是不存在道德规则的”（Beitz，1979；Walzer，1977；Nye，1983）。 P239-240

普世主义，否认国家边界所具有的深刻道德含义，“将国家内部事务排除在外部道德审查之外是没有理由的，一些国家的成员对其他地方的人担负正义的义务是可能的”（Beitz，1979）。 P240

就像功利主义一样，它强调的是行为者的行为而非动机，不管是不是良好的动机。要了解政治领导人

对个人道德的价值判断来判断他们作为政治家的行动，也是不合理的（Hoffmann，1981）。 P242

2、《霸权之后》的笔记-第39页

因此，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必须能够自由使用关键的原料，控制主要的资本来源，维持庞大的进口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商品的生产商拥有比较优势。中国在原料、市场方面对美国形成挑战，但资本来源（国际金融中心）和高附加值商品竞争力方面还有待提高。

3、《霸权之后》的笔记-第141页

粗略的概测规则所提供的便利，以及长远而不是短视地计算自身利益所具有的优点，促使利己主义的各国政府，尤其是那些深受有限理性限制之苦的政府，更加倾向于遵守国际机制的规则。有限理性使得各国政府倾向遵守国际规则。这解释了理性利己主义限制下各国为何坚持国际规则。

4、《霸权之后》的笔记-第123页

把国际机制看作是提供信息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实体，而非一个半政府性质的规则制定者，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持久性。

5、《霸权之后》的笔记-第6页

在本书中，基欧汉明确的对传统的以权力为基础的国际合作理论提出质疑，他认为：霸权后的合作是可能的。所谓以权力为基础，即是：“霸权稳定论”（单极体系）。国际体系要稳定，必须有一个霸权国家或霸主存在。这个霸主能够并愿意为国际体系提供保持一定安全、经济稳定之类的国际公共物品，那么国际社会就保持一定的秩序与和平。

如果不存在霸权国家或其处于衰落之中，那么国际体系就陷入会乱或发生霸权战争。

霸权后的合作：首先，国际机制的建立。“在国际关系的议题领域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对传统霸权稳定论的修正：实质是，霸权国家倡导下的国际机制，确保着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和平。

其次，霸权衰落和国际机制的崩溃之间存在一个“时滞”。机制维持在霸权衰落之后的惯性，使之对世界中的和平与合作仍然起着独立作用。

所以，霸权后的合作是可能的。

因此，机制的维持和建设就成为霸权之后合作与和平能否持续的关键因素。国际机制对于促进“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对减少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纷争与不和是有价值的，对管理国际相互依赖是有意义的。

但，本理论同样存在漏洞：静态理论（static theory）而非dynamic theory。

如：因果论证缺陷。

如：霸权与国际政治经济日趋加强的相互依赖有助于国际制度的产生，但有些国际制度反应了权力分配而有些却没有；有些制度稳定有些却脆弱；有些制度带有强迫性有些带有自我执行能力etc.，对此，功能主义的解释捉襟见肘。

6、《霸权之后》的笔记-第29页

华尔兹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不从总体上考虑国际体系的影响，而单从单位层次分析出发来建构理论的错误所在。所以这样说，有两个愿意：第一，在单位层次上作因果分析是困难的，……第二，淡淡从“由内及外”的方法来解释国家的行为，会导致研究者忽视行动的背景问题，因为各国处于竞争状态这个事实，队所有国家都会产生压力。

国际关系理论家大多是由外而内地分析，即将国内政治作为常量而不是变量。这就是对阴谋论者的驳斥，但是否也成了精英政治（阴谋主导者）的同谋呢？参看《霸权之后》。

7、《霸权之后》的笔记-第125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机制是不费任何代价就能建造起来的，那么构造这些机制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时，不付出任何代价也能达成一致的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会等到特定问题显露出来时，才制定相关的协议去处理这些问题；它们没有必要去构造国际机制以促进协议的达成。准确的说，协议和机制构造的高成本，使它们变得非常重要，而机制建设的高成本有助于既有机制的延续。

。

《霸权之后》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